

时移世易：城市迁移经历与公平感知

——来自 CGSS 的经验证据

肖志文¹ 刘爱玉²

(1. 北京大学 光华管理学院, 北京 100871; 2.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 北京 100871)

摘要:本研究从“时-空”二元路径出发,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考察个体的迁移经历对其公平感知的影响。研究发现,基于社会空间的变迁和参照系统的复杂化,迁移经历将使个体感受到相对剥夺,进而使结果公平认知下降;基于空间转换后在流入地面临的制度性与社会性偏见,迁移经历将显著降低个体的机会公平认知,而伴随时间变化的自我参照对改善公平认知所带来的积极效应微乎其微。作为一个整合性的分析框架,“时-空”二元机制对迁移经历-主观态度变迁的考察具有启发性,与此同时,本研究也有助于厘清流动人口的心理认知与精神空间,并为促进社会融合、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学理支持。

关键词:迁移经历;结果公平;机会公平;户口;时空机制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699.2024.03.005

2017年始,全国各个城市纷纷投入到“抢人大战”的进程之中,超过100个城市出台了人才引进的相关优惠政策,以刺激城市发展活力。然而,一时“抢人”容易,长久留人困难,在人口迁移与流动成为社会常态的如今,如何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不仅关乎大中城市激活经济动力的战略意义,更关乎政治治理的合法性与稳定性,影响制度政策设计与和谐社会建设。

户籍制度是中国社会独具特色的政治管理与社会分层制度^[1]。户籍不仅与居住地域密切联系,更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市场就业乃至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脱离原籍的流动人口不仅在地域上“漂泊”,更面临着一系列的制度壁垒和融入困境。事实上,影响移民社会融入与城市生活和谐稳定的关键,在于个体对社会公平的感知。人们对公平的感知体现在两个维度——机会公平与结果公平^[2]。机会公平强调机会在不同人群中的公平分配,即认为社会中所有人都应该拥有获得成功和实现社会流动的权利与机会;结果公平则追求实质意义上的公平,要求收入和财产等有价资源在社会成员之间相对均等分配。流动人口面临的系统性困境极有可能使公平感知下降,从而,在微观维度,阻碍个体的向上流动与价值实现;在社会维度,降低大众对实现社会流动的信心,使阶层固化成为固有认知。

学界对农民工群体的公平感问题作了丰富的理论探索和实证分析^[3-6]。然而,该领域仍有进一步值得开拓的空间:其一,在样本选择上,相关研究通常将目光聚焦于农民工群体,或选择特定城市的流动人口进行分析。然而,农民工以及“乡城流动”人口,仅仅是当代中国社会迁移人群中的一部分,现

收稿日期:2023-09-1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不稳定工作与性别观念重塑”(编号:21BSH080)。

作者简介:肖志文,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社会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育社会学、社会心态研究;刘爱玉(通信作者),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劳动社会学、组织社会学等研究。

有研究未能对流动人口的全貌予以考察。与此同时,在机制分析上,相关研究局限于组间比较,这使得其对迁移因果效应的考察面临严重混淆。其二,以往研究也未曾对其间的内在机制予以考察。事实上,物理流动也是社会流动。物理空间发生变动的同时,承载着社会制度与关系网络的社会空间,以及涵盖个体知觉与情感体验的精神空间同样在发生变化。因而,公平观念的变迁,也是多维空间变迁的结果。其三,学者们通常关注分配的结果公平,而忽视了机会公平。在当今中国,后者同样重要,甚至在流动人口的感知中更加敏感。公众之所以容忍结构性不平等,是因为民众将结果的不平等视作发展的必然代价,并将现实的不平等视作自己或子女未来向上流动的预期。这一认知筑基于机会公平的理念之上,而机会公平一旦遭受侵蚀,势必将影响社会稳定乃至政治合法性的认同。流动人口由于户口的农业性或外地性,在生活与发展机会上时常面临阻碍,也因此最有可能产生机会不公的认知。所以,在人口流动成为社会常态的如今,关注机会公平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笔者将基于全国性的代表数据,探究“迁移经历”对个体“公平感知”变迁的影响,力图回答以下问题:其一,迁移经历将如何影响个体的公平感知?其二,夹杂着时空变化等多重要素的迁移经历,在促使公平感发生“流动”时,其作用机制如何?对“迁移经历-公平感知”这一效应及其内部机制的考察,也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流动人口的内心世界与精神空间,从而完善制度政策设计,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与社会安定。

一、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迁移突破了物理和地域界限,进而改造了个体所处的社会空间,并促动精神空间的嬗变,最终形成了公平感的流动。社会空间的改变具有多重意涵:一方面,社会空间生发于人际互动与社会网络^[7],因此,个体在改变居住地域的同时,社会空间中的人际网络、参照群体都将随之改变,这也将重塑个体的相对剥夺感和主观态度,并影响个体对当下分配结果的公平感知;另一方面,社会空间还充满了博弈与冲突、竞争与分隔^[8]。在迁移的语境中,原本对实现社会流动和享受优质公共服务抱有期待的个体,在户籍壁垒下,很可能遭遇基于户口的偏见,而导致机会公平感的下降。不过,迁移经历还蕴含着时间流动的意涵:迁移个体在生命历程中与自我过往、现状及未来的参照,或许与空间机制的影响不同。对自我向上社会流动的感知、对未来继续向上流动的期许,则很可能改善个体的公平感。所以,时间机制与空间机制对公平感的影响可能截然相反,这也是本研究详细探索迁移经历与主观态度变化这一因果效应内部机制的原因。

(一) 参照变动:迁移与结果公平感的下降

社会空间是集体生活与社会互动的表征,个体所处社会空间的变迁,蕴含着关系链条和社会网络疏离或瓦解、建构或重塑的可能。在进行社会比较时,人们通常会选择亲身经历与相识人群作为参照加以判断^[9]。正因如此,社会空间中人际网络的变化,将导致人们在衡量公平与否时的“参照群体”发生“变异”。王元腾指出,农民工更倾向于将其他农民工和流入地的本地居民作为参照,而家乡人群则不再作为社会比较的对象,户口移民亦是如此^[10]。在城乡流动中,跨越原有边界,而选择城市人口作为参照对象的趋势将随着迁移时间的延长而日渐明显^[11]。这些证据都意味着迁移个体参照群体的复杂化:由单纯的迁出地居民,转换为混杂着迁出地居民、流入地居民以及共同迁移者在内的多元群体。这一变化也将重新影响个体的相对剥夺感知、自我评价和主观阶层定位,并最终影响公平感的变迁。

外部社会空间中“参照群体”的变化,将重塑人们对于“相对剥夺”的感知。相比于稳定的本地参照系,在这一更加复杂的参照系中,个体面临着多重“夹击”。近年来,中国的收入差距和不平等程度在不断加深,而不平等的来源更多是城乡、区域之间的差距^[12],因此,跨越城乡和区域的个体将感受到巨大的收入冲击,进而感受到相对经济地位的下降。而人们的损失厌恶^[9](loss aversion)情绪因地位的“劣势”感知影响个体的结果公平感。

“相对剥夺”不仅来源于“我们得到了什么”,同时源自于“我们如何得到我们所得之物”^[13]。个体对分配过程认知和对分配结果归因的差异,也会形塑其公平感知。一般而言,高阶层定位者,更可能采取内部归因的方式,将个体行为归之于自身性情、个人能力与努力程度;而低阶层定位者则时常寻求外部归因,将问题归咎于社会环境、制度与结构,来解脱自我对个体行为及其结果可能担负的责任^[14]。这一外部归因通常是结构性的不公平,因而,相比于内部归因者(高阶层定位者),外部归因者(低阶层定位者)可能会形成更强的分配不公感知。在社会空间剧烈变化之中感知到主观阶层地位下降的迁移个体,更可能进行外部归因并使其公平感下降。

综上所述,伴随着物理时点改变带来的社会空间的复杂变迁,本研究假设迁移经历将从以下维度影响个体的结果公平感。

假设1:相对剥夺路径。

假设1a-社会比较机制:迁移经历,会降低个体的相对经济地位,使其感受到更强的相对剥夺,进而导致结果公平感的下降。

假设1b-阶层定位机制:迁移经历,会让个体的主观阶层地位有所下滑,更易进行外部归因,进而导致结果公平感的下降。

(二) 户籍分隔:迁移与机会公平感的下降

社会空间不仅表征社会互动与集体行为,同时还是一个承载权力运作的场域。有研究者指出:个体、团体和阶层之间的区隔构成了日益分化的社会的基本逻辑^[15]。而现代社会也正是由不同“场域”交叉渗透而形成的“社会空间”,不同行动者在其间运用各种资本,通过博弈和互动来保卫或争取有利的社会位置^[16]。社会空间之中的区隔与博弈,在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的交往中也有所体现。迁移个体在物理空间中的位置变动,也意味着在社会空间中的户口身份变换。这一身份转换牵扯着利益与权利的可得性,因而将不可避免地受制于社会空间中本地人口的自我保护与社会偏见。而对偏见经历的感知,也将影响个体公平感的变迁。

户籍制度是当代中国重要的社会分层系统。早在计划经济时代,城市户口便与个体利益关联密切。伴随着市场经济改革与人口大规模迁移,这一身份界限从农村与城市之间延伸至城市内部,流动人口与城镇居民存在差距:一方面,外来移民在就业上占据相当的“劣势”^[17-18],即使顺利进入就业市场,在收入上,外来移民与本地居民仍“同工不同酬”^[19]。这一差距不能仅仅以两个群体之间的生产力差异来解释,其间暗含对外地移民的偏见^[20]。另一方面,外来移民还面临居住空间的区隔^[21-22]、社会保障的缺位^[23-24]、子女教育的受限^[25],这些制度层面的困境,终将使怀抱着向上流动愿望的迁移个体,对制度阻隔与政府公共服务有所顾虑,并进一步投射至机会受限的主观感知。

与此同时,在社会层面,饱受户籍限制的移民,也常感到更加强烈的精神焦虑与社会冲突^[26]、排斥情绪和社会隔离^[27]、融入困难与适应本地^[28]。久而久之,异乡人“漂泊无依”之感也将导致迁移个体机会公平感因为户口身份的偏见而难以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流动。

由此,在户籍制度分割的影响之下,“制度性偏见”和“社会性偏见”将成为个体对迁移后新社会

空间的重要认知,这一精神空间的嬗变,将引发个体对机会公平评价的变化。

假设2:偏见经历路径。

假设2a-制度性偏见感知机制:迁移经历,会使个体对“制度性偏见”有所感知,进而导致机会公平感降低。

假设2b-社会性偏见感知机制:迁移经历,会使个体对“社会性偏见”有所感知,进而导致机会公平感降低。

户籍移民(permanent-migrants / hukou-migrants)与流动人口(floating-migrants / non-hukou-migrants)不同,尽管对迁移经历的体察相似,但由于其已获得本地户口,偏见感知更加有限,机会与权利限制同样较少。

假设2c-户口区隔机制:由于户籍移民实现了户口的本地化,户籍移民对机会不公的感知相比于流动人口要更弱。

(三)时变参照:迁移与公平感的改善

观念的变迁离不开个体对于时间流的感知。在迁移过程中,个体对时间流的感知不仅包括空间上的地理越界、风物人事上的时移世易,还包括对自我地位的确知。换言之,迁移经历将影响个体在不同社会层级之间的流动感知,流动与否、方向、距离,都将影响个体对于当今社会分配的机会与结果是否公平的切实认知。

中国的迁移与跨区域流动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29],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和长三角、珠三角地区^[30]。究其原因,是因为在巨大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背景下,发达地区可以为流动人口提供更充足的就业机会、更完善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而在众多影响因素之间,“收入”的吸引力尤为突出。既然收入与经济回报构成了个体迁移决策的核心考量,那么迁移势必将影响个体主客观定位的变化。在自我参照系中,客观收入的增加和主观自我定位的提升是显而易见的。以往研究也证实,无论是客观收入^[10],还是主观流动感知^[31],对公平认知的改善都具有积极影响。

与此同时,“隧道效应”(tunnel effect)指出:参照群体境遇的改善也可能对个体带来积极的示范效应,使其对收入差距和不平等有所容忍^[32]。这一假设成立的关键在于,他者的优势境遇可以被视作自己的未来预期,当“信号效应”而非“剥夺效应”占据主导时,即使是低收入的人,也会容忍暂时的不平等,从而期望未来的自己或子女有朝一日跻身高收入行列,这种预期可能导致局部范围内经济越不平等的区域,民众幸福感越强^[33]。流动人口亦如是,他们会将城市居民的收入情况视作自己未来收入的“积极信号”,进而表现出较高的收入满意与幸福感^[34]。拥有积极预期的个体,也更容易怀有“绩效主义”观念,遵循差异化的分配原则,并对结果和机会的分配公平产生认同。

假设3:社会流动路径。

假设3a-经济增益机制:迁移经历,会增加个体收入,进而改善机会公平感和结果公平感。

假设3b-流动感知机制^①:迁移经历,会使个体形成相对过去自我的向上流动感知,进而改善机会公平感和结果公平感。

假设3c-预期图示机制:迁移经历,会使个体对未来流动充满预期,进而改善机会公平感和结果公平感。

①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向上流动感知”与前文“相对收入地位下降”和“主观阶层地位下降”貌似矛盾,但实则可能同时发生。事实上,迁移对个体的主观定位会发生双重影响:其一,基于空间维度,个体与周围人群相比较时,主观地位与相对收入可能有所下降;其二,基于时间维度,个体与过去的自己相比较时,主观定位有所上升。两者相互作用,将从截然相反的方向影响个体的公平感知。这也是本研究区分“时-空”双重机制的原因和意义。

二、分析框架与模型设定

(一) 数据介绍与描述性统计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始于 2003 年,是我国最早的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学术调查项目。CGSS 系统全面收集社会、社区、家庭、个人等多个层次的数据。其中,2015 年对迁移经历、阶层认知、流动体验、偏见感知、公平观念的全面测量,是本研究的核心关切所在。剔除缺失值及流往乡村的样本之后,本研究的基准分析有效样本共 9 130 人,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无迁移经历		有迁移经历		均值差
		N	均值	N	均值	
因变量	结果公平因子得分	6 646	0.01	2 356	-0.04	0.04 *
	机会公平因子得分	6 711	0.04	2 382	-0.17	0.21 ***
社会人口学变量	城市	6 771	0.50	2 404	1.00	-0.50 ***
	男性	6 771	0.51	2 404	0.44	0.07 ***
	年龄	6 771	56.95	2 404	55.44	1.51 ***
	汉族	6 771	0.92	2 404	0.94	-0.02 ***
	党员	6 771	0.09	2 404	0.18	-0.09 ***
	自评健康程度	6 771	3.63	2 404	3.73	-0.11 ***
	自评心理健康	6 771	3.82	2 404	3.96	-0.14 ***
	农村户口	6 771	0.68	2 404	0.44	0.24 ***
	教育年限	6 771	8.31	2 404	10.79	-2.48 ***
家庭层面变量	子女数量	6 771	0.81	2 404	0.71	0.11 ***
	有配偶	6 771	0.77	2 404	0.78	-0.01
	父母教育程度	6 771	4.41	2 404	6.24	-1.84 ***
	家庭经济地位	6 771	2.66	2 404	2.71	-0.06 ***
工作状况(没有工作=0)	没有工作	6 771	0.41	2 404	0.44	-0.03 **
	非农工作	6 771	0.34	2 404	0.54	-0.21 ***
	务农	6 771	0.26	2 404	0.02	0.24 ***
个体认知能力	英语水平	6 771	-0.04	2 404	0.26	-0.30 ***
	普通话水平	6 771	-0.08	2 404	0.32	-0.40 ***
空间机制变量-相对剥夺	相对收入地位	6 748	1.71	2 388	1.75	-0.04 ***
	主观阶层评价	6 729	4.30	2 387	4.48	-0.19 ***
空间机制变量-偏见感知	总体服务满意	6 304	0.05	2 249	-0.16	0.21 ***
	一般性社会信任	5 492	0.04	2 146	-0.06	0.10 ***
时间机制变量-社会流动	向上流动感知	6 696	0.76	2 378	0.63	0.13 ***
	收入	6 415	22 000	2 289	42 000	-20 000 ***
	向上流动预期	6 425	0.89	2 289	0.91	-0.02 ***

注:***、**、* 分别表示 1%、5%、10% 的显著性水平。

(二) 变量说明

1. 公平观念

因变量“公平感知”是基于对问卷中的李克特量表通过因子分析进行“降维”得到的因子得分^①。其中,“结果公平”侧重合理化现实社会的收入差距,反对财富和收入的均等化,并强调个体异质性和后天努力的作用。问题包括“应该从有钱人那里征收更多的税来帮助穷人”以及“现在有的人挣钱多,有的人挣钱少,但这是公平的”。“机会公平”强调机会与资格的公平性,注重自己及后代社会流

^①此外,笔者还使用了将不同问题直接加总得到因变量的方式进行检验。两种处理方式的结果在系数方向和显著性水平上基本一致。

动的可能。其问题包括“只要孩子够努力、够聪明,都能有同样的升学机会”和“在我们这个社会,工人和农民的后代与其他人的后代一样,有同样多的机会成为有钱、有地位的人”。

2. 迁移经历

本研究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是“迁移经历”,即曾经发生过迁移或目前正在迁移这两类人群^①。CGSS数据为我们提供了三类定义迁移的题器,分别为“人户分离”定义(“您目前的户口登记地”以及“您是哪一年离开户口登记地的”)、“最近一次流动”定义(“您是哪一年来到本地居住的”)和“出生地”定义(“您出生时母亲的主要居住地是”)。三类定义均可界定个体是否发生迁移流动,但其界定范围各有不同。首先,“人户分离”定义仅能识别流动人口/非户籍移民,而无法界定户籍移民,这与本研究对“经历”的关注不符。此外,“人户分离”定义识别的是个体的最初而非最近一次流动,由于公平感的形塑过程依赖于当下的社会网络、参照群体、偏见经历和时下节点的阶层定位、流动感知,因而需对最新的迁移经历有所识别和关注。这也是“人户分离”定义并不适用本研究情境的原因。其次,“出生地”定义的测量较为模糊,由于母亲分娩时所处地点的偶然性,可能会识别出“虚假的流动人口”。不仅如此,“出生地”题器在测量时更可能出现有遗忘或错误回答的现象,在界定迁移经历时也可能存在偏误。因此,本研究选择了“最近一次流动”定义,作为识别个体迁移经历的依据。“您是何时来到本地居住的”这一问题不仅可以识别出所有的迁移经历,并可以通过与“人户分离”题器的结合,来划分流动人口与户籍迁移人口。此外,该题器还排除了探亲、学生假期回家之类的短期流动,排除了不符本研究理论关切所聚焦的类别^②。

需要注意的是,本研究的理论关切在于“城市迁移经历”,即由乡入城或在城市之间流转等经历对个体公平观念的影响。由城入乡或在乡村之间迁移流动在总人口中占比有限^[30],且流动原因较为特殊、群体性质特别,并非本研究所关注的对象,因而,在数据分析时剔除了最终迁移至乡村的群体。

3. 控制变量

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基本的社会人口学变量,如性别、年龄(及其平方)、教育年限(及其平方)、民族、政治面貌、是否就业、工作性质、自评健康程度、自评心理健康等;迁移相关变量,如城乡归属、户口类别。同时,加入了一系列家庭相关变量,如婚姻状况、子女数量、父母教育程度、家庭经济地位等;个体认知能力变量,如普通话水平、英语水平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4. 中介变量

其一,相对剥夺路径:社会比较,即与同龄人相比的相对社会经济地位,以“与同龄人相比,您认为您本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是较高、差不多,还是较低?”这一问题进行判定;阶层定位,指的是个体自评目前所处的社会等级,为1~10分制。

其二,偏见经历路径:制度性偏见的变量设置为个体对政府在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社会管理与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公共服务满意度而形成的因子得分。而对社会性偏见的感知意味着流动人口与本

①不包括迁移后回流至家乡的人群。笔者认为这部分人群的迁移经历对其公平感知的影响会弱于现实所处境遇的影响,“家乡”的经济水平、社会制度、社会分层等将影响更甚,因而与假设预期不符。

②遗憾的是,由于本研究使用的是截面数据,因此对“迁移经历”中“本地居民”的识别,实际上包括了“一直在本地居住的居民”和“迁移后回流至家乡的居民”,即并没有识别并剔除曾经有过迁移经历但回流的群体。不过,这并不会影响本研究结论的稳健性。依照后文的机制和分析结果来看,迁移经历会降低个体的公平观念,而在流动人口回流至家乡之后,公平感很有可能会恢复到迁移之前的水平,或者至少有所恢复而不会保持迁移时的低水平。这就意味着,对于迁移经历-公平观念变迁这一因果效应的估计只会有所低估(因为回流群体“混入”了本地居民,且回流群体公平感相对较低,从而导致本研究所识别的“本地居民”公平感相对偏低),而不会影响系数的方向和稳健性。因此,本研究所谈论的“迁移经历”包括正在迁移或完成迁移融入本地的情况,而不包括迁移后回流的情况。

地居民社会交往的疏离和一般性社会信任的下降。因此,我们根据邻居、远邻、同事、相识等四类人群作因子分析得到“一般性社会信任”作为“社会性偏见”的代理。

其三,社会流动路径:经济增益,即客观收入变化带来的中介影响;流动感知,即通过对自己当前阶层定位和十年前阶层定位比较得到的结果^①。向上流动预期,即使用个体对自己未来阶层定位与现在阶层定位的比较来确定其是否具有向上流动的预期。

(三) 分析方法

本研究的基准分析使用 OLS 回归方法,然而由表 1 可知,迁移人口与不迁移人口在各变量上均存在显著差异:前者相对而言更加“精英化”(更年轻、教育年限更长、收入更高),而 OLS 回归难以解决这一选择性问题的。因此,笔者将使用基于倾向值的一系列方法对迁移经历的选择性进行处理,通过使用基准回归中的控制变量对个体的“迁移决策”进行预测,并寻找相似的“迁移倾向值”个体进行比较,此外,还使用了基于倾向值的双重稳健逆概率加权法(augmented inverse probability weighting, AIPW)对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从而对内生性问题进行初步处理与解决。

三、数据分析

(一) 迁移经历与公平感知的变迁

表 2 加入了社会人口学变量、迁移相关变量、家庭层面变量及个体认知能力后的分析结果。由模型(1)~(2)可知,迁移经历对结果公平的影响非常弱,且并不显著。这也意味着其内部可能存在多重抵消机制,为我们进一步探寻中介效应提供了启发。由模型(3)~(4)可知迁移经历会显著降低个体的机会公平感知,降低幅度达 0.092 个标准差。这也意味着,怀抱“绩效主义”信念,对未来充满预期的“精英化”群体在迁移过程中,可能“备受打击”。

表 2 迁移经历对公平感知的主效应

变量	结果公平感		机会公平感	
	(1)	(2)	(3)	(4)
	因子得分	加总	因子得分	加总
迁移经历	-0.026 (0.028)	-0.038 (0.039)	-0.092 *** (0.028)	-0.156 *** (0.048)
N	9 039	9 039	9 130	9 13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省级固定效应	NO	NO	NO	NO

注: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 1%、5%、10% 的显著性水平。

接下来,笔者基于 Logit 模型,利用个体社会人口学特征、认知能力、家庭层面变量等预测个体的“迁移”概率。之后,设定卡尺为 0.01 并进行 1:1 匹配,对匹配后的样本平衡性进行分析发现,两组人群几乎可以视作是同质的,因此,便可以将控制组(无迁移经历)的结果视作处理组(迁移经历)的反事实结果,从而估计“迁移经历”对于“公平感知”的因果效应。

由表 3 可知,迁移经历对机会公平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影响效应在 0.08~0.21 个标准差之间波动;与此同时,迁移经历可能也会降低个体的结果公平认知,但这一负向效应在多数情境下并不显著。

^①当然,许多迁移行为发生的时期要短于十年,我们采用了问卷中另一较为短期的题器进行替代性的稳健性检验,这一题器为“与三年前相比,您认为您的社会经济地位是上升了,下降了,还是差不多?”两个题器的分析结果一致。

表 3 迁移经历对公平感知的影响-基于倾向值的分析

变量	近邻匹配		核匹配		AIPW	
	结果公平	机会公平	结果公平	机会公平	结果公平	机会公平
迁移经历	-0.023 (0.066)	-0.082 ** (0.035)	-0.044 * (0.024)	-0.210 *** (0.024)	-0.039 (0.038)	-0.101 *** (0.030)
N	8 992	9 083	9 039	9 130	9 039	9 130

注:这里的因果关系系数为个体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ATE);***、**、* 分别表示 1%、5%、10% 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标准误为 Abadie-Imbens 稳健标准误。

(二) 机制分析:“时-空”二元路径

1. 患寡而更患不均:迁移与结果公平

表 4 展示了迁移经历-结果公平这一效应的中介机制。其中,模型(1)~(2)代表基于空间维度的相对剥夺机制,模型(3)~(5)代表基于时间维度的社会流动机制。从上至下,表格各行分别为迁移经历对结果公平的直接效应,通过中介变量影响的间接效应,以及两者之和——总效应。为探察中介机制的来源,我们在表格中同样展示了“迁移经历-中介变量”与“中介变量-结果公平”双重链条,以期发现中介效应的影响如何构造而成。

从“迁移-中介”的分析结果可知:迁移会强化个体的相对剥夺感,由乡至城、由小城镇走向大城市的过程,迁移个体的参照系统将发生巨大变化。面对强烈的收入冲击与差距感知,个体对自身相对收入与经济地位的评价显著降低,主观阶层定位也随之下降。“中介-结果”的分析显示,这些主观层面的劣势感知都对结果公平感的下降具有十分显著的影响。

表 4 迁移经历对结果公平感的中介效应分析

效应	相对剥夺路径		社会流动路径		
	(1) 社会比较: 相对社会 经济地位	(2) 阶层定位: 主观阶 层地位	(3) 经济增益: 客观 收入	(4) 流动感知: 过去向 上流动	(5) 预期图示: 向上流 动预期
直接 效应	-0.047 (0.030)	-0.050 * (0.030)	-0.068 ** (0.030)	-0.055 * (0.030)	-0.057 * (0.030)
中介 效应	-0.010 *** (0.003)	-0.007 ** (0.003)	0.011 *** (0.004)	-0.001 (0.002)	0.000 (0.001)
总效应	-0.057 * (0.030)	-0.057 * (0.030)	-0.057 * (0.030)	-0.057 * (0.030)	-0.057 * (0.030)
迁移- 中介	-0.051 ** (0.016)	-0.118 ** (0.046)	9048.67 *** (884.72)	-0.037 (0.041)	0.009 (0.036)
中介- 结果	0.192 *** (0.022)	0.056 *** (0.008)	1.2e-06 *** (3.9e-07)	0.039 *** (0.008)	0.029 *** (0.010)
N	7 352	7 352	7 352	7 352	7 352

注: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 1%、5%、10% 的显著性水平。

与此同时,社会流动与跃迁体验的纵向时间机制在总体上而言却并未有预期的影响。客观收入的增加显著改善了个体的结果公平认知,而无论是对过去向上流动的感知,还是未来向上流动的预期,中介效应均十分微弱。假设 3 未能得到完全验证。进一步来看,从“中介-结果”链条可以得知,流动感知和向上预期都对结果公平具有显著的改善作用,改善幅度分别为 0.039 和 0.029 个标准差。然

而,从“迁移-中介”链条的结果来看,迁移经历却并没有显著增强个体的向上流动感知和预期,甚至存在微弱的负向影响(迁移经历对过去向上流动感知的效应系数为-0.037),这意味着,在迁移的过程中,时间变化与过去的自我参照,严重受制于空间意义上的社会比较。尽管实现了客观收入的增长,但人们通常不会认为自身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有所改善。与此同时,个体对未来的预期也受制于制度环境和社会偏见而难以实现。正因如此,社会流动路径几乎失效。时间机制的微弱,也体现了劣势地位情境与损失厌恶^[9]的影响。事实上,相同单位的获益和受损对个体情绪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差异,通常而言,人们对受损会更加敏感。因此,即使迁移促进了收入的增加,但此时收入优势所带来的“一丝丝欢喜”早已湮没于和新的参照系进行社会比较所致的相对剥夺之中,正所谓“患寡而更患不均”。

2. 异乡人还是跃迁者? 迁移与机会公平

表 5 展示了迁移经历对于机会公平的中介效应,可以发现,与结果公平感的分析结果类似,时间机制十分微弱,而空间机制稳定且显著。由此可见,假设 2 得到了确证,而假设 3 暂时无法得到验证。具体而言,从“迁移-中介”链条来看,具有迁移经历的个体,由于户口身份及其来源地的限制,在流入地面临系统的制度性偏见,也进而产生更低的公共服务满意度;与此同时,由于居住地域的隔阂、社会网络的封闭以及普遍存在的刻板印象。“中介-结果”链条的分析结果显示,无论是制度性偏见还是社会性偏见,都对机会公平认知具有显著影响,即对公共服务满意度更高、一般性社会信任更强的个体,也就较少地感受到来自制度与社会的偏见,进而认定更加积极的机会分配。迁移经历人口因为受到偏见感知的影响,不可避免会对自身发展机会、未来自身和子代的流动预期产生怀疑和不满,进而导致了机会公平感的下降。

表 5 迁移经历对机会公平感的中介效应分析

效应	偏见经历路径		社会流动路径		
	(1) 制度性偏见: 公共服务 满意度	(2) 社会性偏见: 一般性 社会信任	(3) 经济增益: 客观 收入	(4) 流动感知: 过去向 上流动	(5) 预期图示: 向上流 动预期
直接 效应	-0.106 *** (0.031)	-0.113 *** (0.031)	-0.115 *** (0.031)	-0.119 *** (0.031)	-0.120 *** (0.031)
中介 效应	-0.013 *** (0.004)	-0.006 *** (0.002)	-0.004 (0.004)	0.000 (0.001)	0.001 (0.001)
总效应	-0.119 *** (0.031)	-0.119 *** (0.031)	-0.119 *** (0.031)	-0.119 *** (0.031)	-0.119 *** (0.031)
迁移- 中介	-0.103 *** (0.030)	-0.098 *** (0.030)	9 239.15 *** (917.25)	0.004 (0.042)	0.028 (0.037)
中介- 机会	0.125 *** (0.012)	0.060 *** (0.012)	-4.51e-07 (4.12e-07)	0.016 * (0.009)	0.025 ** (0.010)
N	6 630	6 630	6 630	6 630	6 630

注: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 1%、5%、10% 的显著性水平。

与空间机制较强的解释力截然相反,经济增益、社会流动感知和预期图示对“迁移经历-机会公平”链条几乎没有任何的中介影响。这也意味着,即使迁移个体实现了收入增加和向上流动,但他们很难将这一流动预期向后代传导。流入地的户籍限制与公共服务缺失,更严重影响了子代的学校质量和教育成就^[25]。因而,收入增加和社会流动的实现可谓十分“挣扎”,制度壁垒与社会偏见仍然构

成机会屏障,阻碍个体公正、平等地实现自我发展与社会流动。此时,实现向上流动的“跃迁者”这一身份更多让位于“异乡人”,从而降低机会公平认知。

值得关注的是,户口移民和人户分离的流动人口具有很大差别。取得本地户口后,个体所受到的制度性偏见将大大降低,诸多资格准入与政策壁垒都将有所放开,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迁移个体已经在规划流入地长久居住、生活,因而,其社会融入与社会适应将显著改善。在弱化的偏见感知中,融入个体,相对于仍在流动中的人口(人户分离人口)而言,其机会公平感将有显著改善。此外,“产权”与本地房屋购买也是“融入”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事实上,购买本地房屋,同样意味着有长久居住与生活的打算。正因如此,个体将逐渐融入本地,从而产生类似的影响。

由表6可知,无论是户口融入,还是产权融入,对改善机会公平认知都有显著影响。此外,通过系数幅度与显著性的变化可以确知,相对于产权融入,户口融入的作用更强。这也说明城乡户口的二元分割,与“本地”“外地”户口的内外区分在社会分层、制度偏见、公共服务差异中仍然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而产权融入仅仅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差距。

表6 迁移经历与机会公平-融入的异质性调节

变量	户口融入		产权融入	
	(1) 机会公平感 因子得分	(2) 机会公平感 加总	(3) 机会公平感 因子得分	(4) 机会公平感 加总
迁移经历 (无迁移经历=0)				
流动人口	-0.138 *** (0.038)	-0.232 *** (0.066)	-0.128 *** (0.042)	-0.220 *** (0.073)
融入本地的外地人口	-0.058 * (0.033)	-0.099 * (0.057)	-0.075 ** (0.032)	-0.125 ** (0.055)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N	9 130	9 130	9 130	9 130
调整后 R ²	0.041	0.040	0.041	0.040

注: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

四、结语与讨论

本研究从“时-空”二元路径系统考察“迁移经历”对个体“公平感知”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从中发现,迁移经历对个体的结果公平感影响有限,仅存在微弱的负向效应;而对个体机会公平感知却有显著的降低作用。从进一步的机制分析探知,空间层面的机制作用稳定且显著,而时间层面的自我参照机制始终相对微弱。具体而言,迁移经历将从相对经济地位和主观阶层定位等维度强化个体的相对剥夺感,进而带来结果公平感的下降;与此同时,以经济增益、过去向上流动感知和未来向上流动预期为代表的时间机制效应微弱,其中,仅有收入增加的中介效应显著,可以使迁移经历促进和改善个体的结果公平认知。正因如此,在涉及公平认知的心理过程中,“患寡而更患不均”的义理再次彰显,横向社会比较的存在与自我评价的落差在个体公平感知中将起到决定性作用,而客观收入的增长在相对剥夺的劣势中逐渐湮没。

异曲同工的是,在迁移经历-机会公平的因果链条中,偏见经历这一空间作用仍占据主导。由于户籍分层和身份效应,迁移个体在流入地面临制度性与社会性偏见。这些偏见感知将在其中植入身份限制和社会分层的基本图景,从而使其不再认同机会的分配公平。与此同时,社会流动这一时间机

制几乎不存在任何影响。这也意味着,由于分层壁垒的存在,迁移个体尽管能够实现自身的收入增加与社会流动,也难以确知流动是否具有代际传递性。此外,“迁移经历”具有内部的异质性,在将其拆解为“流动人口”和“融入人口”并进一步分析后发现,由于户口迁移至本地的“融入人口”受到更少的制度性偏见与社会性偏见,相比于流动人口,迁移经历对前者机会公平的损害相对有限。

本研究重点关注了迁移经历对个体机会公平感的影响。尽管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呈现出收入差距扩大和经济不平等的趋势,但公众对此却形成了积极稳定的认知,任何基于先赋性的,抑或身份性的资格限制、权利阻碍、机会不公都会引起社会公众的“反感”。因此,机会公平的培育及其制度环境的建设,在当今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至关重要。

在迁移与流动人口的研究谱系中,探索迁移带来的社会后果,尤其是迁移对于心理态度和主观认知的影响,不能秉持物理空间变换的单一线性叙事,而应同时观照社会空间的复杂变迁与精神空间的丰富内涵,并厘清流动个体在时间变动上的自我参照变化。本研究尝试建构一个关于“时-空”二元路径的分析框架,希望整合“地理空间迁移”与“社会阶层流动”以及“纵向自我参照”与“横向社会比较”之间的关联。社会流动本就蕴含横、纵双重意涵,这也对应于空间变化与时间流转,夹杂客观地位的变迁与主观认知的嬗变。若要厘清迁移对主观认知的影响,则必须兼顾时-空、主-客、横-纵、自我-社会等多重维度。

参 考 文 献

- [1] 陆益龙. 户口还起作用吗:户籍制度与社会分层和流动[J]. 中国社会科学, 2008(1): 149-162.
- [2] 孟天广. 转型期中国公众的分配公平感:结果公平与机会公平[J]. 社会, 2012, 32(6): 108-134.
- [3] 李骏, 顾燕峰. 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户籍分层[J]. 社会学研究, 2011, 25(2): 48-77.
- [4] 胡荣, 陈斯诗.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与公平感[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4): 97-105.
- [5] 龙书芹, 风笑天. 社会结构、参照群体与新生代农民工的不公平感[J]. 青年研究, 2015(1): 39-46.
- [6] 王甫勤. 新生代与传统农民工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因素研究[J]. 中国人口科学, 2016(5): 110-119.
- [7] 何雪松. 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J]. 社会, 2006(2): 34-48.
- [8] 胡森森. 空间的嬗变、私化与终结以 Z.鲍曼的后现代空间思想为中心[J]. 社会, 2009, 29(3): 74-100.
- [9] TVERSKY A, KAHNEMAN D. Loss aversion in riskless choice: a reference-dependent model[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1, 106(4): 1039-1061.
- [10] 王元腾. 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与改革损益感:城乡分割背景下的再考察[J]. 社会发展研究, 2015, 2(2): 173-195.
- [11] WANG J. Rural-to-urban migration and rising evaluation standards for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in contemporary China[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17, 134(3): 1113-1134.
- [12] XIE Y, ZHOU X. Income inequality in today's China[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4, 111(19): 6928-6933.
- [13] VERWIEBE R, WEGENER B. Social inequality and the perceived income justice gap[J].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2000, 13(2): 123-149.
- [14] 胡小勇, 李静, 芦学璋, 等. 社会阶层的心理学研究:社会认知视角[J]. 心理科学, 2014, 37(6): 1509-1517.
- [15] BOURDIEU P. The social space and the genesis of groups[J].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1985, 24(2): 195-220.
- [16] 刘欣. 阶级惯习与品味:布迪厄的阶级理论[J]. 社会学研究, 2003(6): 33-42.
- [17] 张春泥. 农民工为何频繁变换工作:户籍制度下农民工的工作流动研究[J]. 社会, 2011, 31(6): 153-177.
- [18] 杨凡, 杜姗姗, 陶涛. 中国流动人口失业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基于 2015 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

- [J]. 人口研究, 2018, 42(4): 14-26.
- [19] 钟笑寒. 劳动力流动与工资差异[J]. 中国社会科学, 2006(1): 34-46.
- [20] MENG X, ZHANG J. The two-tier labor market in urban China: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and wage differentials between urban residents and rural migrants in Shanghai[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1, 29(3): 485-504.
- [21] 张子珩. 中国流动人口居住问题研究[J]. 人口学刊, 2005(2): 16-20.
- [22] 何焰华, 杨菊华. 安居还是寄居? 不同户籍身份流动人口居住状况研究[J]. 人口研究, 2013, 37(6): 17-34.
- [23] 杨菊华. 城乡差分与内外之别: 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研究[J]. 人口研究, 2011, 35(5): 8-25.
- [24] 张开然. 落户门槛筛选与异地医疗制约: 流动人口健康不公平的解释[J]. 人口与发展, 2023, 29(2): 95-109.
- [25] LIANG Z, CHEN Y P. The educational consequences of migration for children in China[J].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007, 36(1): 28-47.
- [26] 李培林, 田丰. 中国新生代农民工: 社会态度和行为选择[J]. 社会, 2011, 31(3): 1-23.
- [27] 崔岩. 流动人口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和身份认同问题研究[J]. 社会科学研究, 2012, 27(5): 141-160.
- [28] 杨菊华. 中国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 2015(2): 61-79.
- [29] 于潇, 陈世坤. 中国省际人口流动与人力资本流动差异性分析[J]. 人口学刊, 2020, 42(1): 30-41.
- [30] 段成荣, 邱玉鼎, 黄凡, 等. 从 657 万到 3.76 亿: 四论中国人口迁移转变[J]. 人口研究, 2022, 46(6): 41-58.
- [31] 马磊, 刘欣. 中国城市居民的分配公平感研究[J]. 社会科学研究, 2010, 25(5): 31-49.
- [32] HIRSCHMAN A O, ROTHSCILD M. The changing tolerance for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cours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a mathematical appendix[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3, 87(4): 544-566.
- [33] KNIGHT J, SONG L, GUNATILAKA R.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its determinants in rural China[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9, 20(4): 635-649.
- [34] AKAY A, BARGAIN O, ZIMMERMANN K F. Relative concerns of rural-to-urban migrants in China[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2012, 81(2): 421-441.

[责任编辑 周 莉]